

如实供述而未被一案处理的刑法处遇

——以刑满后发现同种余罪的处理为切入点^{*}

陈军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摘要: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而司法机关未一案处理,同案犯的潜逃、异地管辖等问题导致部分犯罪事实未能被查证属实。但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刑罚执行完毕后,未被查证的得以证实,此时对于余罪的处理争议不断。笔者认为虽然可以将未被证实的犯罪认定为漏罪,但是不宜依照刑法第七十条进行数罪并罚。在对后罪单独定罪量刑时,应当考虑前罪已经执行的刑罚来决定后罪的刑罚期限。在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办案不利的后果应当由司法机关来承担,不应该由犯罪嫌疑人来负担。因此在如实供述的条件下,司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能审结案件应对后罪从轻处罚或者甚至是放弃追诉。只有这样才是对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的促进。

关键词:如实供述;漏罪;疑罪从无;余罪

DOI: 10.3969/j.issn.1672-9846.2017.02.005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846(2017)02-0022-06

一、问题的提出

本题提出主要基于两个案例:案例一为2005年3月至2007年3月,王某在担任某服装公司总经理期间,在销售公司日常营销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属下赵某,多次以借为名索取或非法收受营销公司经理的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公司赠品采购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生产方回扣归个人所有,总计收受人民币500万元(以下简称“前罪”)。2007年案发后,赵某潜逃(后于2016年10月3日被抓获)。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案件事实,并主动将980万元赃款交到公安机关扣押。后法院于2009年1月19日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暂扣的500万元贿赂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15年12月31日,王某刑满释放。2016年12月20日,王某再次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2017年1

月26日被逮捕。王某再次被起诉是因为赵某的归案。2007年案发后,行贿人和赵某潜逃,所以导致部分犯罪事实无法查证属实。后赵某归案,部分犯罪事实(140万元,以下简称“后罪”)得以查证,司法机关遂侦查起诉^①。

鉴于后罪是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司法机关重新追诉,现有法律对此情形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围绕着上述案例的后罪,审判法院应该如何处理存有较大的争议。通过查找相关的资料,笔者发现与上述案例有相似的案件:

案例二为2014年2、3月期间,李某在甲地实施12起盗窃,在乙地实施1起入户盗窃。2014年4月29日,李某被甲地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全部罪行。案件侦办过程中,甲地公安机关要求乙地公安机关协查李某在乙地实施的入户盗窃,乙地公安机关表示该案由乙地自行侦办并于2014年6月24日立案侦查。2014年9月12日,甲地公安机关以李某在甲地

^{*}收稿日期:2017-05-25

作者简介:陈军辉(1991-),男,安徽太和人,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实施的12起盗窃向甲地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甲地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公诉,李某因前罪被甲地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015年4月28日,李某刑满释放。后乙地公安机关又以其在乙地实施的盗窃向乙地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乙地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公诉^[1]。

二、观点聚讼:多种不同意见的交锋

针对上述案例中后罪的刑法处置,理论与实务界存有以下多种不同的观点:(1)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将前罪与后罪一并再审,并以一案定罪量刑;(2)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认定前罪、后罪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的数罪,然后数罪并罚;(3)后罪系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以后被发现,不属于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漏罪,应单独判处;(4)依照刑法第七十条规定,认定后罪为前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的漏罪,数罪并罚^[1]。

案例一与案例二基本案情相似,均是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罪行但司法机关并未一案处理。案例一未被一案处理是因为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潜逃等原因致使部分犯罪事实无法查证属实,从而引发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后罪”该如何处罚的争议。案例二则是因为司法机关异地管辖的问题导致一案被分为两次处理,因此关于“后罪”处理争议的观点也大致相同。

其中,案例二(已决案件)的审判法官支持上述第四种观点,并且认为“只要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而未一案认定,都属于漏罪”。最终李某因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结合其因前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②。按照法官的审判思路,是依照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因此李某因后罪刑罚的执行期限为两个月。显然这一刑期弥补了未被一案处理所带来的缺陷,但判决中“数罪并罚”的合理性、合法性却值得商榷。因此有另外一个疑问产生:案例一的处置是否应参照案例二的判决,认定后罪为漏罪并且与前罪进行数罪并罚呢?

三、观点的分析

虽然案例二已有判决结论,但是上述的争议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针对案例二,审判法官认为前三种观点均存在问题。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

对其支持第四种观点的理由表示怀疑。依据第四种观点,该法官认为应当将后罪认定为漏罪,并且是属于“前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的漏罪,“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侦查机关也就掌握了相关犯罪线索并着手开展侦查取证,也就意味着发现的开始,发现的状态自然延续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故将后罪认定为漏罪未突破法条本身的文义^[1]”。并最终得出后罪可以适用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进行数罪并罚的结论。

但该结论的得出缘于对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的时间前提适用的误解。依照其理解,“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这一期间是对发现其他罪(即漏罪)时间的限定,进而得出发现状态延续到该期间也应当被认定为漏罪。却忽略了该适用前提同样对“并罚”的时间限定,即后罪与前罪的并罚必须也是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前。本案中,前罪已有判决而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罚的时间前提并不存在。将后罪认定为漏罪并依照第七十条进行数罪并罚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并罚”是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因此新判决决定的刑期必然小于前后判决总和刑期,大于前、后两个判决的刑期。只有当前判决刑罚未执行完毕才有适用新刑罚的可能,换言之,前判决还在执行过程中才能在原判决刑罚的基础上继续执行新的刑罚。因此该判决结论值得商榷。

(一)其余三种观点的评判

上述观点一认为,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前罪、后罪一并再审。具体理由是:针对案例二,犯罪嫌疑人李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将甲地与乙地的犯罪事实一并追诉,又因为前、后罪均是盗窃罪,属于同种罪,应当累计犯罪的数额,这样定罪量刑对李某更为有利。针对案例一,犯罪嫌疑人王某归案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属于同种罪),司法机关应该将交代的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后一并处理,而非先处理已经查证属实的搁置未被查证的。同样案例一也会涉及到累计犯罪数额,一案处理会更有利于被告,所以应该再审。

虽然该观点指出一案处理有利于被告,但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刑事

案件再审的条件是: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且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列举了“新证据”的类型,但是即便发现“后罪”得以证实的新证据,是否就意味着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前罪事实确有错误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不能仅因为原判决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全面,未涵盖所有的犯罪事实而否定原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的正确性。即便新证据的出现会影响定罪量刑,也不能得出此前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结论,否则会推断出前判决是冤假错案,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刑事诉讼法学上的通说认为:只要是后来有新的事实被发现,那就只能是重新起诉和判决的问题,不存在原来的判决有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4月16日《关于判决宣告以后又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同种漏罪是否实行数罪并罚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不论新发现的罪与原判决的罪是否属于同种罪,都应当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显然上述两个案例中前后罪属于同种罪,如果是后罪在前判决宣告并生效后刑罚未执行完毕前发现,应当数罪并罚,而不应该是前后罪一并再审。该批复主张余罪发现后应当数罪并罚而非一并再审,除非是前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中前判决不仅发生了法律效力并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所以不论是一并再审或者数罪并罚都不满足该批复的适用前提。

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判决宣告前已经发现后罪,因此后罪不属于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漏罪。故而应当对后罪单独判处有期徒刑,然后与前罪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进行数罪并罚。但是该观点存在明显的错误:其一,该案中前罪已经作出判决并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前罪已经被处理,不符合刑法第六十九条的时间条件。其二,前后罪本属于同种数罪,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未能一并处理。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刑法分则条文将数额(或数量)较大作为犯罪起点,并针对数额(数量)巨大、数额(数量)特别巨大的情形规定了加

重法定刑时……应当累计犯罪数额,以一罪论处,不实行并罚^[3]。”因此认定前罪、后罪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然后数罪并罚的观点不符合刑法第六十九条的适用条件,第二种观点的理论根据存在错误。

依照第三种观点,后罪是在前判决执行完毕后才被发现,不符合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所以后罪不能被认定为漏罪,因此也就不能够数罪并罚,只能对后罪单独定罪处罚。案例一中,2007年案发时王某即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而前罪刑罚执行期间为2009年1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案例二中后罪的立案侦查时间是2014年6月24日,此时李某即已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而前罪的刑罚执行期间为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4月28日。从上述的时间节点来看,在前罪判决生效之前司法机关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犯罪事实,但是由于特殊原因,前判决未作处理。

(二)漏罪的认定与延伸

漏罪,从法条的本意理解就是“已决罪犯在判决生效前还存在应被判决而未被判决的犯罪事实”。构成漏罪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存有一个已经向被告人宣告并且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仅仅是宣告即可。因为判决宣告并不意味着判决的生效,可能因为二审、再审等原因推迟判决的生效时间。其二,漏罪的发生时间必须是在前判决生效以前,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判决生效以后那就属于新罪而非漏罪,新罪的处罚应该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漏罪的发现期间是介于前判决生效后,刑罚尚未被执行完毕前。在此期间之外发现的罪行一般不属于漏罪。其三,漏罪必须未超过追诉时效,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除了特别规定外,漏罪发现超过了追诉时效就不应再受追究。

如果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如实供述而判决宣告后才查证属实的是否应该认定为漏罪呢?如案例二所述,笔者认为判决前已经供述而判决后才查证属实,因管辖问题前判决未审理后罪犯罪事实,那么后罪应该属于漏罪。对于漏罪的认定,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最大的争议点在于第二个时间条件即“漏罪的发现时间”。有观点提出,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漏罪的“发现”,应该是新发现被判刑的犯罪

分子故意隐瞒的在判决宣告以前就存在的罪行,而不应该包括犯罪分子在宣判之前主动交待过的而没有被查实的犯罪事实。“发现”一词的基本解释为:“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4]”。但对于“发现”的解读不能仅停留在字面含义,漏罪的发现应该是某一时间段而非某一时间点。本文案例中,判决宣告前司法机关即已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的犯罪事实,但是由于特殊原因而未能及时处理,那么未被处理的犯罪事实的发现状态自然延续到判决生效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因此满足发现漏罪的时间前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一书中,将《刑法》第七十条中的“发现”解释为:“是指通过司法机关侦查、他人揭发或犯罪分子自首等途径发现犯罪分子还有其他罪行^[5]”。由此可见“漏罪的发现标准”并非是“经查证属实”的定案标准。“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认定新发现的犯罪事实是服刑人员所实施的”应当是漏罪的成立标准而非漏罪的发现标准。漏罪发现标准过高将会导致“发现”的时间点后移,超过上述的时间期间,那么需对后罪单独处罚,对犯罪嫌疑人不利。

(三)禁止重复评价

刑法上的重复评价,是指将一个犯罪事实在定罪量刑中反复进行评价。但是重复评价得出的结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使得犯罪嫌疑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应予以禁止、舍弃。刑法上的重复评价包括定罪上的重复评价和量刑上的重复评价。关于禁止定罪上的重复评价问题,如行为人非法行医^③,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第三次又非法行医的构成非法行医罪,那么刑满释放之后又有第四次非法行医行为时应给予行政处罚还是直接认定为非法行医罪呢?基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行为人第四次有非法行医行为时不应认定构成犯罪而应处于行政处罚。“量刑上的重复评价,是指犯罪构成要素(定罪情节)在定罪过程中已经被刑法评价过一次后,再次作为裁量刑罚所应考虑的因素或情节重复使用的情形^[2]”。正因为禁止从重复评价,理论上才产生想象竞合等归责形式,但是禁止重复评价也有例外,如依照法律的规定,累犯、毒品再犯从重处罚。

在案例一中,2007年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全

部罪行,但是司法机关查证属实的仅仅有500万元,其交代的包括140万元在内的犯罪事实并未查证属实,如果在刑满释放后单独对140万元进行处罚存有重复评价的嫌疑,同时势必会加重王某的刑罚负担,而且也不符合禁止重复评价的例外规定。如果单独对140万元进行定罪处罚,刑罚的期限势必大于3年,加上之前的12年刑期,那么前后的刑期势必大于15年。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法律规定的是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才为15年)。如此以来,王某将承担不公平的对待。“在将某种事实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时,即便没有明显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可能存在重复评价的嫌疑,并由此得出明显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结论的,也于重复评价的范畴,应当予以禁止^[2]”。因此对刑满释放后发现的同种余罪单独进行处罚必然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四、笔者的观点

针对上述意见笔者已一一作了分析,并认为案例一、案例二中虽然后罪属于漏罪,但是不应该依照上述第四种观点对前罪和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即不能参照案例一中的判决)。虽然对于后罪犯罪事实可以单独定罪处罚,但是具体刑罚期限应当考虑前罪已经执行的刑罚来决定后罪的刑罚(如结合前后罪确定一个总和刑期,然后减去已经执行的刑罚得出后罪的刑期)。

(一)司法实践中漏罪的刑法待遇

如果漏罪在刑满后才被发现,且漏罪为不同种罪行的,司法机关的处理也较为简单,即对新发现的罪重新进行判决,其刑期就是罪犯今后要服刑的期限。如此处理,也是妥当的^[6]。例如甲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满释放后发现之前还犯有抢劫罪,因此单独对抢劫罪判决即可。当漏罪是在前罪刑满释放后才被发现,并且漏罪与前罪属于同种罪行,那么又该如何处理呢?司法实践中贯彻着这样一种思路:分别发现、分段处理的“分别评价”,亦即一旦发现新的事实,司法机关可以随时针对新发现的犯罪事实再次起诉、法院再次判决。对漏罪“单独定罪”不会轻纵犯罪分子,这一处理方式从程序上看,似乎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

如果漏罪在刑满后才被发现,且前后罪属于

连续犯,此时不应将遗漏的罪行作为单独的犯罪来处理。“只有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才能做到罪行均衡,否则将会违反刑罚的公正性。尤其是对有些罪刑法只规定了一个量刑幅度,如果犯罪分子犯了数个这种性质的罪,其中一罪已达到了应当判处最高法定刑的程度,不实行并罚就等于其余的犯罪不受处罚^[7]”。例如甲某因涉嫌两次贪污,每次均是贪污50万元,那么审判时仅发现了第一次的贪污行为,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又发现后一次的贪污行为,那么对遗漏的犯罪行为的单独定罪势必导致两次刑罚期限之和大于两次贪污合并处理的刑罚期限。因此,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满释放后发现同种余罪的情形,周光权教授提出应采用“综合评断的方法”,以原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来的判决。应当在漏罪发现之后,将前后两罪的犯罪数额累加、综合起来进行一次性评价(而非重复评价),确定一个新的刑期,减去已经执行的刑罚后,宣告仍需执行的刑罚期限。

上述同种余罪的“综合评断方法”,虽然避免得出了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结论,但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再审的启动是否于法有据则存有疑问(能够以原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情形启动再审,上文已作分析)。虽然可以将上述案例中的后罪认定为“漏罪”,但是既不能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进行数罪并罚,亦不能根据刑法第七十条进行数罪并罚,而单独对后罪犯罪事实定罪量刑显然刑罚过重,立法存在疏漏导致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但司法实践中分别发现、分段处理的“分别评价”的范围应当有所限缩,否则连续犯的处罚以及类似上文的案例的后罪处置将导致不公平的处罚。

因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刑满后发现同种余罪时,对后罪(漏罪)的犯罪事实虽然可以单独定罪处罚,但是刑罚期限应当考虑前罪已经执行的刑罚以此来决定后罪的刑罚。质言之,不应该忽略犯罪嫌疑人已然受罚的事实,前罪的刑罚期限应当作为后罪的量刑情节。至于这一量刑情节的适用,可以参照一案处理时的刑期以及前罪的刑期综合评断,以此得出的后罪的刑期是合理的。这样的处理既不会涉及再审及数罪并罚,也能够体现对被告人的公平对待。

(二)如实供述对漏罪处置的影响

上述案例与普通的刑满后发现同种漏罪并不相同,案例一、二中有特殊的情节不能被忽视: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毫无隐瞒。只是因为案例一中同案犯的潜逃,王某所供述的犯罪事实未能查证;案例二中异地管辖问题而导致多次犯罪行为未能一并处理。

一般来说,漏罪未被发现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故意隐瞒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司法机关不能发现某些犯罪是该犯罪嫌疑人所为或者即便知道某些犯罪事实但是并不全面。因此一旦发现漏罪司法机关便可以随时追诉,刑罚的必然性使得司法权威得以巩固,从而打击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但是案例一中王某主动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而查清案件事实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司法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①届满之前查明案件的事实。

但如果允许司法机关可以随时发现犯罪事实随时进行追究而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那么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可能行为人一旦犯罪就会终生不得安宁,永远也无法摆脱司法机关的掌控。如本文所举案例,某人因贪污100万元,如果以不受法律规定查明案情期限的钳制,那么司法机关便可以每次只起诉20万元,剩余的权作为未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待前判决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再另行起诉20万元,最终导致的刑罚期限将远远超过100万元一次性处理的刑罚期限,所以这样显然不公平。

有观点提出,上述处理结论使得控方将不管证据是否充分,都会起诉100万甚至更多。并推测笔者认同以下观点:若控方在第一次时不全部起诉的,后来便不能再根据新的事实起诉。虽然在上述例子中只认定了20万,但如果以后出现新证据,这个案件可以通过再审推翻,仍可以认定100万。最终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其实更加不利于被告人的利益。但笔者认为:首先,既然行为人已然如数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假若此事实认定属实),那么如果最终法院认定为100万元并沒有任何错误,行为人也是罚当其罪,但是如果将100万元分开来起诉将会导致刑罚的加重。其次,新证据的出现是否必然会推翻涉及20万元的前判决呢?答案是否定的,前文已作分析。最后,笔者所认为的第一次时不全部起诉的,后来便不能再根据新的事实起诉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犯

罪嫌疑人已经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并未对此查证属实,那么司法机关再次根据新证据提起诉讼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即便是重新起诉审判,那么后罪的刑期也应考虑前罪的刑期以及如实供述等情节。

就案例一而言,既然王某已经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并且前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为12年,虽然司法机关并未起诉640万元(查证的500万元加上未查证的140万元),但显然此刑罚处罚过重且并未考虑到如实供述等情节,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原审判决法院判决的刑期已经涵盖了当时未被查证属实的140万元,即量刑时已作考虑。而当同案犯赵某归案后又要以受贿140万元为由进行重新进行侦查起诉,该“漏罪”的再次定罪量刑显然是重复评价,使王某承受不应有的刑罚负担。

由以上争论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期限届满而未查清的责任归属问题,应由谁来承担查证不力的不利后果?王某、李某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所犯罪行,司法机关后续如何处理不属于王某、李某的控制范围。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司法机关未能及时处理后罪,这样的不利后果显然不能再由犯罪嫌疑人来承担。否则,在此情形下如果司法机关可以随时随地对余罪进行追究而不受限制,那么将会对司法机关起到不良的暗示作用,司法机关的侦查、证据的查证效率将大打折扣,刑事诉讼的期限设定将形同虚设。当然,对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作严格的要求,应当符合有关自首的司法解释要求^⑤。这样虽然不一定构成自首但是在后罪的处理中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我国刑诉法中并未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是在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并未及时处置,在前罪审判时已知晓漏罪但并不加以处理是否意味着对漏罪的放弃追究。尔后在超过法定期限后又能以什么理由再次

起诉审判呢?因此笔者认为,考虑到如实供述全部罪行、司法机关侦办不力、前审判决未处置等情形对后罪应从轻处罚甚至是放弃追诉。

注释:

- ①案例一是由真实的案例改编而来,该案件仍停留在侦查起诉阶段。
- ②文章中并未涉及到具体刑罚的期限,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减去已经执行的期限。
- ③2008年4月9日《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以非法行医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非法行医罪。
- ④具体的期限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
- ⑤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二)以及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具体认定。

参考文献:

- [1]唐荣璠.如实供述而未被一案处理的属于漏罪[N].人民法院报,2016-06-16.
- [2]周光权.论禁止重复评价——以刑满后发现同种余罪的处理为切入点[J].人民检察,2012(9):5-10.
- [3]张明楷.论同种数罪的并罚[J].法学,2011(1):47-54.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8-369.
- [5]朗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6-87.
- [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28-429.
- [7]蔡桂生.论连续犯与同种数罪的区分及刑事处罚[J].福建法学,2007(2):6-9.

